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埃里克·S·赖纳特 (Erik S. Reinert) /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013033053

F061.3  
66-2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How Rich Countries Got Rich and  
Why Poor Countries Stay Poor

埃里克·S·赖纳特 (Erik S. Reinert) / 著

杨虎涛 陈国涛 等 / 译

杨虎涛 / 校

贾根良 / 审订



北航

C1640959

F061.3  
66-2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美) 赖纳特著; 杨虎涛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4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7268-2

I. ①富… II. ①赖… ②杨… III. ①发展经济学-研究 IV. ①F0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60852 号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

埃里克·S·赖纳特 著

杨虎涛 陈国涛 等译

杨虎涛 校

贾根良 审订

Fuguo Weishenme Fu Qiongguo Weishenme Qio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插页 1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23 000

定 价 58.00 元



北航

C1640959

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译者前言

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赖纳特的名字或许并不陌生。早在 2007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他和中国人民大学贾根良教授合编的论文集《穷国的国富论》；同年夏天，金融时报也曾刊载过其副主编和著名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等人就全球化与不平等发展问题与赖纳特和张夏准的系列辩论文章。2008，赖纳特凭借这本《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获得了当年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的缪尔达尔奖。从内容上看，此书依然秉承了赖纳特此前的思想和主张，但相较于单篇论

文以及论文集而言，此书更显系统化，其脉络也更为清晰，并且有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观点。

赖纳特本人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虽然受教育于主流经济学的大本营，但赖纳特却是名副其实的逆反者，他极力抨击脱离现实的主流经济学及其各种政策主张，将主流经济学及以主流经济学为基础的政策主张视为对发展中国家的麻醉剂和毒药。赖纳特的这种思想取向，与他长期在联合国发展组织的工作经历不无关系，正是在拉美、非洲和东亚的长期工作调查经历，使赖纳特对不平等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强的现实意识。他将自己和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夏准、阿曼达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称为替代性教规（alternative cannon），以区别于主流经济学体系。而经济学界则对其理论冠以了演化发展经济学、熊彼特重商主义经济学（Schumpeterian Mercantilism, Esben Sloth Andersen, 2008）等名称。在理论分析上，赖纳特尤其注重经济史尤其是经济政策史的价值，在使用历史比较方法的同时也强调时空特定性，注重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的结合。在本书中，他既向读者展示了大量的经济史实，又详细地阐明了关于报酬递增、协同效应和不对等贸易等理论，在主张发展中国家“按富国过去做的那样做，而不是按富国现在说的那样做”时，赖纳特又强调了外在约束条件的变化和相应政策措施的调整。

译者认为，《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核心在于对富国之道或者说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探讨。对这一机理的说明，集中体现在第6章的两个图中。（即图16 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马歇尔计划和图17 贫困的恶性循环——摩根索计划。）在赖纳特看来，富国之道或者说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一种三者并存的模式：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的高投资率。这三者的并存与互动构成了经济的良性循环：更高的实际工资带来更高的需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从而有利于发展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有利于实现更高的投资和更高的利润，同时人力成本的上升会倒逼出“节约劳动”型的技术创新；税基的扩大和税收的增加使政府更有能力投资于公共事业，使基础设施、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得到改善，而这又会促进企业投资、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保障了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和经济质量。

这种良性经济循环的启动点在哪里？赖纳特的答案是：正确的产业。产业结构如同一张网，各类经济活动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这张网上，

存在着最能引发联动效应的“结点”，而赖纳特所说的“正确的产业”就是这种“结点”。更具体地说，这种“结点”就是那些具有技术外溢性、能带来报酬递增的产业活动。一旦选择了这样的产业活动，那么，由此引发的技术外溢就会带动其他行业发展提高，从而带来全面的生产率提高。这又将以更高的实际工资惠及国民，从而形成更高的需求、更高的储蓄以及更持久和更广泛的税基。换言之，要实现富国富民，就要大力培育具有高技术外溢性的行业，并使之与其他行业产生互动效应，从而提升整体经济质量。

如何判断是否选对了“结点”呢？赖纳特认为，在实际工资水平上升、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企业高投资率中，重要的是要观察实际工资水平这个指标。因为在这三者的循环中，如果特定生产活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只是产品价格的下降而不是更高的实际工资，良性循环就会由于缺乏更高的需求或者说更大的市场规模而无法形成。整个循环也会因此而打破。

产业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有高有低，这体现在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上。从这种溢出效应来看，经济活动可分为高地经济与低地经济。前者能使更多的部门产生联动效应，是居于高地的“溢出者”；后者则很难对其他部门产生溢出，是处于低地的“被溢出者”。真正能带来经济良性循环的产业活动是高地经济。如果一国具有较多的高地经济，这种溢出效应就会惠及更多的部门和产业。而由于所有这些部门的劳动力都共享一个劳动力市场，这种联动效应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就会使更多的国民得到好处——实际工资上升，进而形成更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使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

因此，就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做什么”比“怎么做”更为重要。赖纳特的著作中有大量此类例证，比如：海地是世界上棒球生产最有效率的国家，人均小时工资只有 30 美分；美国的新贝德福德是世界上高尔夫球生产最有效率的地区，人均小时工资达到 14 美元。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无须任何创新、只需手工缝制，后者却需要大量的材料工业和研发机构支持；前者是无技术溢出效应的“技术死胡同”行业，后者是能持续产生技术外溢的行业。而赖纳特也指出，目前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富国拥有最具有技术外溢性的高地经济，其经济活动总是与知识、创新、报酬递增等联系在一起，因而能够持续地创造财富；而穷国所从事的



则是“被富国技术溢出”的低地经济，如原材料生产、粗加工或产品包装等，这种技术外溢很少的经济活动无法使本国进入良性经济循环。如果一国不愿长期停留在这种低地经济的国际分工位置上，就必须进行自主创新，创造自己的高地经济。

如何培育正确的产业活动呢？赖纳特的观点是产业保护和激励创新。但将赖纳特理解为一个纯粹的保护主义者或者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者又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赖纳特反对的只是不对等条件下的自由贸易，而他所主张的保护，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他主张的是那种“好的”保护，即能保持国内竞争、核心技术被国内所控制的、建立在一种动态的熊彼特世界观基础上的实时、适度的保护，而不是那种“坏的”保护，即那种在国内市场（通常是非常小的）对成熟工业或产品进行的持久性的保护和几乎没有国内竞争的、核心技术基本上从国外引进的保护。因此，笔者认为，附录Ⅳ中关于两种保护主义的比较值得研读。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一书的另一闪光之处，在于它对华盛顿共识 2 型的批判。近些年来，对于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学中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析思路和观点。除了早期的产权、制度决定经济发展的解释之外，又相继出现了民主决定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决定经济发展、甚至地理位置、气候、细菌疾病决定经济发展的解释，这类观点非常具有迷惑性。赖纳特认为，这些解释都是主流经济学的一种“范式维持技术”，在以民主、创新、地理位置、气候、细菌疾病等主题来维持主流经济学的吸引力和解释力的同时，华盛顿共识也在不断改头换面，已由最初的华盛顿共识 1 型转变成了华盛顿共识 2 型，其核心从“让价格正确”拓展到了如产权、制度、民主政府、核心竞争力和创新乃至地理气候、疾病等。赖纳特认为，这种添加版的华盛顿共识 2 型更具迷惑性和误导性。虽然产权、制度体系、竞争力、创新乃至气候、地理和疾病细菌病毒等因素有一定解释力，但认为它们就决定了经济发展，却是在“颠倒因果”。尽管这些因素的确与经济发展相关，但它们不能表达经济发展过程的核心：正确的经济活动。在赖纳特看来，是相应的经济活动选择导致了相应的产权结构和制度体系等产物，而不是反之，而华盛顿共识 2 型的种种解释与相关政策恰好就是颠倒了这种关系，推行治标而不治本的发展政策。

本书的初译工作分别由如下人员完成：第 5 章由杨威翻译，第 2 章由徐广路翻译，第 3、4、7 章由陈国涛翻译，杨虎涛翻译了第 1、6、8 章及

序言。

由于能力所限，此书的翻译虽然力求准确，但仍不免有缺憾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译者



## 中文版序

能为《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这本书的中译本作序，我感到非常荣幸，尤其是在中国经济正以世界瞩目的速度增长的历史时刻。本书探索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特征，而关于这一特征的研究，可追溯到1613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安东尼奥·舍拉（Antonio Serra）的开创性工作。舍拉指出，在所有行业的生产活动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基础上的分工深化将产生协同作用。在我看来，这正是当下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生产结构变得越来越精细和专业化；形成了大规模的、相互关联的、具有多层次供

应关系的产业集群。而这些，都是创造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的条件。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创造了“历史报酬递增”（historical increasing returns）这一术语，意指规模报酬递增与技术变迁的联合效应。这些效应在理论上很容易分离，但在实践中通常不行。因为一般来说，新技术在原有的规模上是不适用的。中国对科学技术的投入表明，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并不仅仅是技术追赶，而是十有八九中国将来也会成为技术领先国，她也将经历巨大的“历史报酬递增”效应。

目前的西方国家——欧洲和美国——看来还在被冷战和华盛顿共识的意识形态的残余所困扰，这多少令我这样的欧洲人感到有点可悲。经济活力的缺失，政治上的两极，要么归咎于政府，要么指责大企业，而无论欧洲还是美国，都是金融部门在掌握着经济发展的方向，注意力都集中在贸易和金融变量上，而非生产和技术上。在很大程度上，对生产部门采取务实的态度——在欧美已经不复存在了，而这些正是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特征所在。在欧洲和美国，金融部门现在已经变成了“使狗”，也就是使实体经济摇摆的尾巴。<sup>①</sup>

是什么因素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免于欧洲和美国所遭遇的困境？中国从一个较低的基础起步，要想达到人们所向往的那种最佳的发展“境界”，当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这并非全部的答案。当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巴西除外）和非洲国家的一些老产业部门和部分新兴产业部门自20世纪70年代始就被华盛顿共识引导下的自由贸易冲击而毁于一旦时，中国和印度却因为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保守”而得到保护。毫无疑问，中国和印度今天的成功，源于对20世纪40年代末期所兴起的那种产业政策的坚持。也正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庞大规模促成了这种幸运的保守意识形态的形成，从而没让华盛顿共识的经济昏招渗透进来并产生破坏。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和印度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太久——在很长时间内其工业都由于受到保护而免于竞争——但历史的经验也有力地证明了一点：此类政策的失败，比起那种相反的政策——一个国家开放得过快的政策——还是要好得多。拉丁美洲国家（再次排除巴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实际工资的急剧下降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在我看来，对这种亚洲例外论（exceptionalism），还有一种经济思想层

---

<sup>①</sup> 意思是应该由实体经济的发展来决定金融部门的发展，现在则反过来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决定实体经济的走向。这里用狗和狗尾巴分别比喻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译者注

面上的解释。1937年，熊彼特在为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的日文版作序时，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熊彼特本人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他仍觉得有必要告诉他的日本读者：他对经济动态的理解与卡尔·马克思是何其相似。他们都是“在经济系统内部寻找力量之源，而经济系统本身会打破它可能达到的任何均衡”。这些力量就是企业家精神和技术变迁。熊彼特还提到他和马克思有着类似的利息理论，对马克思来说不变资本不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对熊彼特来说完全均衡条件下的利息率将为零。

可以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济战略之所以能够实现，得益于政治左派与右派的联合，以及洞悉马克思的知识分子与理解熊彼特动态的企业家的联合。这种结合，使日本没有选择使国家陷入贫困的比较优势战略。在我看来，对马克思—熊彼特动态有不同理解的左派与右派的幸运融合，从那时起已经主导了整个亚洲地区的发展，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这与美国和欧洲所表现出的那种政治缺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和欧洲，基于李嘉图静态世界观的左派和右派之间那种非建设性的对抗在左右着这些地区的发展。

当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所鼓吹的那些东西时，这些帝国就失去了昔日的实力。在英国，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年提出的贸易理论只是英国试图保持它在制造业领域的实际垄断地位而采用的工具。100年后，在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之后，英国的农业和工业已经由于自由贸易而遭到严重损害。美国也一样，还是这种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错误地描述成一种能够产生自动的经济和谐机制的理论，现在严重地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实力，与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美国的实际工资根本没有增长。

这本书是在2006年12月的最后几天完成的，并在2007年4月出版。在这本书最后的某一段中我写道：“……严重的金融危机越来越有可能，凯恩斯主义将在一个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再度实施。”对于是否实施全球凯恩斯主义，我们现在正在中间位置上左右挣扎，“货币战争”成为了当前的主题。对这一点我也写道：“‘自由贸易’作为当今世界经济秩序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有可能延缓解决将来问题的办法的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非常像20世纪30年代对‘黄金标准’的顽固信念延缓了凯恩斯主义的实施。”更糟糕的是，现在的欧洲已经实现了一体化，这与当年的情况完全不同，而各个分散的小经济体则面临着一种我们称之为欧元的新的“黄金标准”。我们可能会看到这种货币联盟将阻止许多欧洲边缘国家政府不履行对政府债券所承

担的义务。

中国的稳定以及她的经济实力也造成了新的困境。原来流行的关税制度很可能被证明比目前的“货币战争”对世界经济的破坏性更小。关税以增加产量为目的，而货币战争将产生巨大的投机性收益。随着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工资及就业率的下降，允许这些国家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事实上可能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乍听起来这似乎有点不合逻辑。对美国 and 欧洲部分产业体系的保护也将保护中国商品未来的海外市场规模。中国商品的一些主要海外市场的购买力的萎缩并不符合中国的长期利益。

本书也描述了亚洲所创造的“雁阵发展”，即同样的产品如何使几个经济体相继“升级”。无疑，中国内部也将产生这种雁阵机制——从沿海一直到内地——中国同样也有可能利用雁阵机制帮助从中亚到非洲的其他国家实现经济“升级”。自19世纪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亲历了西方的霸权主义，从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及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到20世纪末具有破坏性的华盛顿共识，中国也看清了英国和美国的经济霸权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不值得模仿。

目前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影响，与我们对一种经济学传统的遗弃直接相关，那是一种以对经济的质的理解和对历史而非数学的理解为基础的经济学传统。在这种欧洲大陆的传统中——从左派的马克思到右派的熊彼特——都把金融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的常态。因为这一理论认识到了技术的作用，也对经济发展不平衡作出了解释。我希望，这种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也就是本书所阐述的理论，在中国会比在目前的西方更具影响力。如果这一希望成为现实，它也会使中国成为一个比她的“先行者们”更加和善的超级经济大国。

Erik S. Reinert

2010年11月

## 致 谢

本书的许多观点都并不新鲜，它归功于那些在过去 500 年里成功地创造而非配置了财富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杰出的思想者，是在 1974—1976 年期间。当时我妻子正在哈佛商学院的克雷斯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这个图书馆专门收藏了一些 1850 年前的经济理论著作，从而使上述思想者的思想得以系统地保存。而我在瑞士圣加伦大学的教授瓦尔特·阿道夫（Walter Adolf Jöhr，1910—1987）也保留了一些古老的欧洲大陆的理念，在克雷斯图书馆我还结识了弗里茨·雷德里奇

(Fritz Redlich, 1892—1978), 他算得上是德国历史学派硕果仅存的人物之一, 正是他, 向我介绍了维尔纳·桑巴特的思想。

本书中亦有一些原创的东西, 主要是我在1978—1979年期间撰写我的博士论文时萌发的一些思想萌芽。这一时期, 我的主要灵感更多地来自于汤姆·戴维斯 (Tom Davis) 讲授的经济史和发展史, 而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古老的思想。此外, 波士顿咨询公司, 特别是他们那种衡量人类学习和经验的方法给了我灵感, 启发我如何区分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还有凡涅克 (Jaroslav Vanek), 也就是国际贸易领域中赫克歇尔-俄林-凡涅克 (Heckscher-Ohlin-Vanek) 定理中的凡涅克, 也使我理解了在一定条件下国际贸易会损害福利。之前我一直觉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有违直觉 (counter-intuitive), 是凡涅克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彻底颠覆使我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后来在康奈尔大学, 约翰·莫瑞 (John Murra) 教授向我开启了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门, 而带有缪尔达尔“累积因果” (cumulative causations) 原则的经典发展经济学, 则构成了特定的理论背景。

自我在1991年重新回到研究领域之后, 五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 他们有些算我的前辈, 有些与我是同时代人, 他们使我明白, 很多旧的观念, 以他们的背景看, 只是不时髦了, 而并非不适当的。他们是: 美国的摩西·阿布拉莫维茨 (Moses Abramovitz), 罗伯特·耐尔·海尔布伦纳 (Robert N. Heilbroner), 戴维·兰德斯 (David Landes), 英国的克里斯托弗·弗里曼 (Christopher Freeman) 和帕特里克奥·布莱恩 (Patrick O'Brien), 这本书是献给他们的。是他们, 保持了长期以来以真实为基础的经济学传统 (reality-based economics), 而这种传统在冷战期间两种乌托邦——也即计划和谐与市场自动和谐的交锋中——几乎完全绝迹。

卡洛塔·佩蕾丝 (Carlota Perez) 关于技术变迁如何产生的观点非常有影响力, 而她是我在思想上最具启发性的“拍档”, 非常感激她的热情帮助。在这方面, 我在塔林科技大学的同事沃尔夫冈·德雷克斯勒 (Wolfgang Drechsler) 和瑞那尔·坎特 (Rainer Kattel) 也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到1991年, 现代演化经济学已经建立起来<sup>①</sup>, 而纳尔逊的有鉴赏力的理论化也对我的思想形成大有帮助。此外还有克雷格 (Jan Kregel) 的后凯恩斯经济学, 霍奇逊的制度经济学和乔莫的发展经济学, 以及由伦德瓦尔

<sup>①</sup> 《演化经济学杂志》于1991年创刊, 作者在这里可能是以这个事件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建立的标志。——译者注

(Bengt-Åke Lundvall) 发起的学习、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建设经济学全球网络 (GLOBELICS) 的学术活动。同样感谢在奥斯陆和威尼斯的替代性教规讨论会上的参与者, 他们是 Daniele Archibugi, Brian Arthur, Jürgen Backhaus, Helene Bank, Antonio Barros de Castro, Ana Celia Castro, Ha-Joon Chang, Mario Cimoli, Dieter Ernst, Peter Evans, Ronald Dore, Wolfgang Drechsler, Jan Fagerberg, Christopher Freeman, Edward Fulbrook, Geoffrey Hodgson, Ali Kadri, Tarmo Kalvet, Jan Kregel, the late Sanjaya Lall, Tony Lawson, Bengt-Åke Lundvall, Lars Magnusson, Lars Mjøset, Alfredo Novoa, Keith Nurse, Patrick O'Brien, Eyup Özveren, Gabriel Palma, Carlota Perez, Cosimo Perrotta, Annalisa Primi, Santiago Roca, Bruce Scott, Richard Swedberg, Yash Tandon, Marek Tiits Francesca Viano. 许多大学的学生和同行们也以多种形式对我的观点做出了反应, 他们提供了宝贵的反馈意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曾作为访问学者到过的大学: 秘鲁工商管理研究生院 (ESAN), 利马商学院和巴西的里约联邦大学以及吉隆坡马来西亚大学的亚欧研究所。在剑桥大学主办的“重新思考发展经济学”项目中 (CAPORDE, Cambridge Advanced Programme on Rethinking Development Economics) 六年的任教经历, 以及替代性教规 (the Other Canon) 在第三世界国家组织的相关课程, 使我有机会作为群体的一分子去发展和形成一种关于经济发展究竟如何产生的新观点。主要的项目都受到福特基金资助, 其中, 蒙特斯 (Manuel Montes) 对创立新发展经济学贡献颇多。在过去的一些年里, 参加联合国系统的一些会议和经历: 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 (CEPAL/ECLA),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DESA), 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南部中心 (South Centre),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及其西非处 (UNDP) 也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观点并建立了从事研究的“人脉”。还要感谢宾根 (Jon Bingen) 和挪威战略研究院 (NORISS,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对我有关成功国家发展战略研究的支持。同时还感谢挪威投资论坛、挪威船业联合会和 Leif Høegh 基金对替代性教规项目所提供的经济资助。

回想 1999 年, 我们一群人在一起花了两天时间讨论一种替代性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并以现实为基础, 从下至上地发展理论, 而不是以物理学为基础, 从上至下地发展理论 (附录 II)。尤其感谢莱昂纳多·布拉马基 (Leonardo Burlamaqui)、张夏准 (Ha-Joon Chang)、朱文侃 (Michael

Chu)、伊文思 (Peter Evans) 和克雷格, 同时还要感谢沃尔夫冈·德雷克斯勒、克里斯托弗·弗里曼、坎特、克雷格和卡洛塔·佩蕾丝等人对本书手稿的志愿性评阅。当然, 本书文责自负, 与他们无关。

特别感谢海德 (Dan Hind), 他还在当时的康斯坦布尔-罗宾逊出版社 (Constable & Robinson) 工作时就启动了本书的出版工作, 感谢康斯坦布尔出版社 (Constable) 的编辑博内尔 (Hannah Bournell) 和夏米尔 (Jan Chamier), 特别是要感谢罗伯特森 (Jane Robertson)。

或许还应感谢更多的人, 因为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家庭项目, 我的两个儿子, 雨果 (Hugo) 和索菲斯 (Sophus) 小的时候总是问我: “为什么我们总是到一些穷地方去旅行?” 雨果和索菲斯现在都已经完成了他们在剑桥大学的博士论文, 他们成了本书宝贵的建议者, 本书的参考文献中也提到了他们。本书的一个精简版 2004 年曾以挪威文出版, 索菲斯和我妻子翻译了大部分章节, 我将最诚挚的感谢献给我的妻子费尔南塔, 她在该项目 1967 年夏形成其研究构想之前就已经与我相识。没有她在我们持续历经的各种各样的冲击——新的居住地、新的国家、新的语言和各种新挑战——中所给予的挚诚、支持、鼓励和坚忍不拔 (她当年在克雷斯图书馆的领导总是这么评价她), 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 本书图表

图 1. 不当的假设导致错误的问题——舒尔茨的“花生”漫画

图 2.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家族树

图 3. 替代性教规经济学的家族树

图 4. 经济循环流动图

图 5. 17 世纪 50 年代荷兰代夫特市基于多样化的创新体系

图 6. 早期的生产率爆炸

图 7. 工业部门的工资决定着经济中其余部门的工资：10 个国家中的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中等工资的购买力比较（1928—1936）

图 8. 生产中型规格男鞋的最优生产力学习曲线：美国（1850—1936）